



中國高校招生變遷

核心提示：中國高考制度，是科學制度廢除之後的另外一種人才選拔機制，對於眾多的普通民眾而言，高考也是擺脫現有生活狀態，提升階層相對公平的途徑。

《華夏早報》首席記者 邱亮

A

解放後的高考： 考試都要到省城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此前的中華民國眾多公立和私立高校均被政府接管。

四川的辜其洌是原成都工業學校的退休教師，他說起當年參加統考的那些事依然記憶猶新，成都解放後，1950年軍管會全部接管了全市的高等學校，但1950年各學校的招生工作，仍由各個學校自行主持。1951年，當時的西南行政區成立了“西南區高等學校壹九五壹年暑期聯合招生委員會”，並在四川成都、雲南昆明、貴州貴陽設立了3個分會，分別於7月下旬展開報名，然後統考、閱卷。

8月下旬閱卷完畢，並在當時的《成都日報》上公布成都分會的錄取名單。當時，西南行政區自己組織的統考考試，僅針對西南地區，主要是選拔和培養本地幹部。無論妳考分多高，都無緣考入“北大”“清華”等全國壹流的高等學校。

在這次統考中，辜其洌考上了華西協合大學數理系。

在山嶽樵夫的記憶中，從1951年起，政府組織高校統壹招考。“當時的統考，和過去各校單獨招生時壹樣，也是不分文理科，中學學過的各門課程都要考，統分時會按報考專業作相應的加權處理。比如考理工的，數理化加權大；考文史的，文史類科目加權大。”

山嶽樵夫錯過了1951年的統考，卻得知由於生源不夠，有些高校在單獨補招，山嶽樵夫決定辭職升學。

山嶽樵夫報考了當時還在青島的山東大學醫學院。山嶽樵夫到了山大後，很快找了個學生宿舍住下。幾天後，他參加了山東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考試，“用的都是密封試卷，印象中，這是僅有的壹項‘保衛’措施。”



B

工農兵大學生： 用麻袋來裝知識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席卷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基本停課，近百萬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失去了參加高考的機會。就這樣，我國的正常高考壹中斷就是十年。我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名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工農兵大學生條件為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要註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的知識青年。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

C

恢復高考： 調用毛選紙張印刷試卷

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讓甘肅的李玉蘭記憶猶新，1977年10月21日，21歲的民辦教師李玉蘭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節目中得知國家恢復高考。讓李玉蘭沒有想到的是，這年全國參加高考人數為570萬人，錄取人數僅為27萬人，錄取率只有4.8%，可謂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和李玉蘭壹樣的570萬1977年高考考生卻不知道，因為國家領導人的壹句話，才讓他們得以實現大學夢。

“那是壹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曾經的77級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國考試發展史》中這麼總結。

1977年7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復出不到壹個月，

當時在農場工作的林錫琦，是最後壹批工農兵大學生。1976年，林錫琦先是被班排推薦，然後是連隊推薦，最後參加了農場組織的相對嚴格的考試。終於在這年冬天，林錫琦拿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林錫琦在復旦大學就讀後來被稱為中文系7611班的76級文學評論專業，55個同學，有插隊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備豐富工作經驗的基層幹部，有高幹子弟，有工廠的技術骨幹，有部隊的宣傳幹事，有真正落實推薦精神、經過相對嚴格入學考試進來的，也有組織指派進來的，開後門進來的。

55個同學文化程度參差不齊：高中畢業生27人，初

中畢業生28人；年齡上也有較大差別：最小的20歲，最大的27歲。

“我到復旦來，就是要用麻袋來裝知識的。”7611班的同學人人都憋著壹股勁，爭分奪秒，誓把被“四人幫”破壞造成的損失奪回來。他們的學習熱情比後來的77級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往屆工農兵學員幸運的是，他們在長期的知識饑渴之後，趕上了壹個好的學習機會，成了那特殊的年代裏的幸運兒，開啟了“文革”之後大學的讀書風氣，雖然在其後的日子裏，這種光榮壹再被77級的光芒掩蓋，被厚重的歷史煙塵遮蔽。

最多晚壹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

正是因為鄧小平的拍板，李玉蘭等人才得以跨越農門。而由於報考人數過多，造成印刷試卷的紙張不足，最後，由中共中央拍板，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李玉蘭拿到了大隊開的介紹信，到了公社，壹進院子就看見好多人拿著表格在那裏填寫。參加高考的人大體上就是回鄉青年、知識青年、復原軍人。

1977年12月11日，李玉蘭迎來了高考，幸運的是，她最終被甘肅師範大學錄取，成為當年27萬佼佼者中的壹員。

D

上世紀90年代： 高考成為脫離鄉村的唯壹出路

對於知名媒體人袁復生而言，1999年的高考是他當年離開農村的唯壹途徑。正如其在自己的著作《壹個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長史》壹書中所述，他在壹個縣城開始衰落的時代成長。

自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高考成為壹個相對公平的階層上升通道，農民子弟逃離鄉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除開高考，就只有廣東等地的流水線工廠。因此，復讀成為當時眾多高考落榜生的常態生活。

1999年的袁復生們，無數個下午，伏在紅磚樓的鐵欄桿上看遠處地夕陽和偶爾飛來的風箏，在紅星幼兒園的樓上等待高考地降臨。理所當然，或純屬意外，袁復生被送到家鄉壹所名為“晨光學校”的補習學校。直到壹年後，武漢大學向袁復生打開了幸運之門。

而對於湖南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的教師鄧明元而言，幸運的人用三年高中時間敲開了大學之門，而鄧明元用了8年，他經常自嘲為八年抗戰。

鄧明元高中畢業的時候，是在改革開放的1992年。當時的大學，並沒有擴招。而且還是國家負責分配的天之驕子。鄧明元時代的高考上線通知，是由縣裏電視臺在節目中公開發布名字。從1992年到1997年的5年時間，每當公布高考上線名單時，鄧明元就在堂兄和侄子的陪同下，前往鎮上能收看本地電視的人家，在類似科舉放榜的形式中，瞪大眼鏡查看自己的名字。

每次落榜後，鄧明元就壹個人呆在家後面的山坡，其侄子則受家中大人的委托，尾隨著，生怕他壹氣之下發生意外。

經過五年的復讀，鄧明元考上外市壹所師範學院，原以為大功告成的他，卻沒有想到，在他四年大學生涯結束後，國家的大學畢業生分配工作的政策卻已經戛然而止。

如袁復生和鄧明元壹樣，還是高考的幸運兒。鄧明元的哥哥，經過多年的落榜後，只身跑到省會長沙，通過自學考試，邊工作邊實現自己的大學夢。而鄧明元的堂姐，多次落榜後，最後壹次高考連成績都沒有勇氣去看，直到當年的高考錄取結束，她才得知，原來自己考上了當地壹所師範專科學校，就這樣與大學擦肩而過。